

略論近代的翻譯小說

王繼權

復旦大學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三次翻譯高潮，那就是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高潮、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高潮和鴉片戰爭後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與文學翻譯高潮。第三次翻譯高潮中，以文學翻譯，尤其是小說翻譯最為繁榮，影響也最大。

從 1840 年至 1918 年的近八十年間，翻譯小說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1840—1894 年為萌芽期。

這一時期，翻譯小說數量很少，有資料可查的，只發現七種翻譯小說。(一)最早的是《意拾喻言》(《伊索寓言》)，係英文、中文、拼音的對照本，英國人羅伯特·湯姆譯，共 82 則。最初發表於 1840 年《廣東報》，後由廣學會刊行。(二)《談瀛小說》(英國斯威夫特《格列佛遊記》中的小人國部分)，約五千字，載《申報》1872 年 4 月 15 至 18 日。(三)《一睡七十年》(美國華盛頓·歐文《瑞普·凡·溫克爾》)，約一千餘字，載《申報》1872 年 4 月 22 日。(四)《昕夕閑談》，蠡勺居士譯，連載於 1873 年 1 月至 1875 年 1 月《瀛寰瑣記》第三至二十八期，上卷三十一回，下卷二十四回，共五十五回。1904 年，經譯者刪改重定，印成單行本，由文寶書局出版，署名改為吳縣黎牀臥讀生。(五)《安樂家》，1882 年畫圖新報館譯印。(六)《海國妙喻》(《伊索寓言》共七十則)，1888 年天津時報館印。(七)《百年一覺》(《回頭看》)李提摩太譯，1894 年廣學會出版。

這七種，有的是寓言(如《意拾喻言》)，有的只有一個故事梗概(如《一睡七十年》，只一千餘字)，真正比較像樣的是《昕夕閑談》，有五十五回，可謂近代第一部翻譯小說。譯者在《昕夕閑談小序》中說：「今西國名士，撰成此書，務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釣譽，真君子神彩如生，偽君子神情畢露，此則所謂鑄鼎象物者也，此則所謂照渚然犀者也。因逐節翻譯之，成為華字小說，書名《昕夕閑談》，陸續附刊，其所以廣中土之見聞，所以記歐洲之風俗者，尤其淺焉者也。諸君子之閱是書者，尚勿等諸尋常之平話，無益之小說也可。」

這一時期，不但翻譯小說很少，還處在萌芽狀態，整個翻譯文學也很少。翻譯較多的是公法和製造技術的書籍，如同文館、製造局所譯的書。當時流行的觀點是：西

方的物質文明比我們強，但精神文明我們比他們優越得多，所以無須引進外來文化。統治階級中比較開明的官僚，爲了自引求富，興辦洋務事業，開始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的「船堅炮利」，進行「練兵製器」活動，舉辦近代軍用工業以求強，創辦近代民用企業以求富，所需要的是輸入製造技術，不重視引進西方的學術文化。知識分子爲傳統思想所囿，也輕視西方文學，所以很少有人去翻譯介紹外國小說；即使有幾種，影響也不大。

二、1895—1904年爲發展期。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戰敗。這一嚴酷的現實，極大地震動了全國人民。許多人開始認識到要使國家富強起來，只引進西方的技術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輸入新學，必須變法。至此，整個思想界、學術界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翻譯方面也是如此。如嚴復，這一時期先後翻譯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論》(1898)、約翰·穆勒的《穆勒名學》(1899)、亞當·斯密的《原富》(1903)、斯賓塞的《羣學肄言》(1903)、穆勒的《羣己權界論》(1903)、孟德斯鳩的《法意》(1904)、甄克思的《社會通詮》等，系統地介紹西方的學說，影響極大。

文學翻譯，特別是翻譯小說，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1899年，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引起極大反響，譯本「不脛而走」，大受讀者歡迎，一時風行全國，被稱爲「外國《紅樓夢》」，有洛陽紙貴之譽。嚴復有詩讚道：「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接著，他又譯了《英女士意色兒離鸞記》(1901)、《巴黎四義人錄》(1901)、《黑奴籲天錄》(1901)、《伊索寓言》(1903)、《布匿第二次戰紀》(1903)、《利俾瑟戰血餘腥記》(1904)、《滑鐵盧戰血餘腥記》(1904)、《英國詩人吟邊燕語》(1904)、《埃司蘭情俠傳》(1904)，另外，曾廣銓譯英國哈葛德的《長生術》(1899，索隱書屋)、周桂笙譯《一千零一夜》(節譯，1900)、楊紫麟、包天笑譯哈葛德的《迦因小傳》(1901，勵學譯編)、跛少年譯英國笛福的《絕島飄流記》(《魯濱遜飄流記》，1902，開明書店)、戡翼翬譯普希金的《俄國情史》(1903，大宣書局)、周桂笙譯《新庵諧譯初篇》(1903，清華書局)、蘇曼殊譯雨果的《慘世界》(1904，鏡今書局)、佚名譯斯蒂文森《金銀島》(1904，商務印書館)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翻譯小說，出現了一些新品種，如政治小說、科幻小說和偵探小說。這幾種小說，在中國傳統小說中是沒有的，譯者把它們介紹進來，給讀者以耳目一新之感，很受大家歡迎。

首先是政治小說。梁啟超1898年在《清議報》上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大力鼓吹政治小說，他說：「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饜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爲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

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而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梁啟超不但從理論上提倡，而且身體力行，親自翻譯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1901，商務印書館）。在他的帶動下，許多譯者也紛紛翻譯政治小說，隨後，陸續翻譯過來的有矢野文雄的《經國美談》（1902，商務印書館）、末廣鐵腸的《香中梅》（1903，尊業書局）、《美國獨立記演義》（1903，《大陸》本）、《遊俠風雲錄》（1903，明權社）、《瑞西獨立警史》（1903，譯書匯編社）、《政海波瀾》（1903，作新社）等等。翻譯政治小說，是爲了配合維新改良運動，是借「說部」「發表政見，商榷國計」（梁啟超語）。這類作品，對於啟發羣衆覺悟，增強民族意識，培養愛國主義精神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其次是科幻小說。中國科學落後，在以往的小說中，沒有這一類作品。這些作品的譯入，擴大了讀者的視野，增強了讀者特別是青少年讀者的閱讀興趣，所以頗受歡迎。這時期翻譯的科幻小說有凡爾納的《八十日環遊記》（薛紹徽譯，1900，經世文社）、《海底旅行》（廬藉東譯，1902，《新小說》本）、《月界旅行》（魯迅譯，1903，東京進化社）、《環遊月球》（1904，商務印書館）、荷蘭達愛斯克洛提斯《夢遊二十一世紀》（連載於《綉像小說》第1-4號；楊德森譯，1903，商務印書館）、押川春浪的《空中飛艇》（海天獨嘯子譯，二冊，1903，明權社）、井上園了的《星球遊行記》（載贊譯，1903，彪蒙譯書局）、押川春浪的《千年後的世界》（天笑譯，1904，羣學社）等。

第三是偵探小說。1896、1897年間，《時務報》上連續發表了四篇英國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英包探勘盜密約案》、《記僞者復仇事》、《繼父誑女破案》、《呵爾唔斯緝案被戕》（1899，索隱書屋刊《新譯包探案》收入此四篇）。1902年《新小說》雜誌上設「偵探小說」專欄，登載偵探小說《離魂病》（披髮生譯述）、《毒藥案》（無歆羨齋主譯述）、《毒蛇圈》（法國鮑福著，上海知新主人譯）。自1903年《綉像小說》第四號起，連續刊載《華生包探案》：《哥利亞司考得船案》、《銀光馬案》、《孀婦匿女案》、《墨斯格力夫禮典案》、《書生被騙案》、《旅居病夫案》。其他出版的偵探小說還有：《泰西說部叢書之一》（柯南道爾著，黃鼎、張在新合譯，1901）、《續譯華生包探案》（1903，商務印書館，此即《綉像小說》上刊載的六篇的結集）、《福爾摩斯再生案》（奚若譯，1903年刊第1-3冊，1906年刊第四冊）、《唯一偵探譚四名案》（嵇長康、吳夢邕合譯，1903，文明書局）、《法國地利花奇案》（1903，江西尊業書館譯印）、《偵探譚》（冷血譯，四冊，1903-1904，時中書局）、《毒美人》（美樂林司郎治著，佚名譯，1904，《東方雜誌》本）、《偵探新語》（索公譯，八篇，1904，昌明公司）等等。

這一時期的翻譯小說比上一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不但數量增加，而且品種增多，爲以後翻譯小說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三、1905-1918年爲鼎盛期。

這一時期翻譯小說有了很大的發展，統計約有一千種左右，大大超過了前兩個時

期的總和。翻譯小說不但數量大幅增加，而且品種更為完備。如短篇小說的大量湧現、虛無黨小說、偵探小說熱的出現、翻譯質量明顯提高、世界名著顯著增多等等。到了「五四」前數年，翻譯文體又鮮明地呈現出向新文學演變的趨勢。

促使本時期翻譯小說繁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這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進入了新階段，形勢的發展鼓舞了中國人民，使大家更迫切地要求輸入西方文化，以反對封建專制主義，這就促進了翻譯小說的繁榮。(二)經過前兩個階段，翻譯小說這一文學樣式，已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讀者已習慣於這種讀物，而譯者也積累了經驗，這就為大規模地譯入翻譯小說準備了條件。(三)這一時期文藝報紙、文學刊物大量湧現，也是造成本時期翻譯小說繁榮的又一原因。據統計，1872—1918年，有文學期刊132種，1905年以前創刊的只有《瀛寰瑣記》(1872)、《新小說》(1902)、《綉像小說》(1903)、《新新小說》(1904)等10種，而1905年以後創刊的有122種。這些文學期刊，一般都刊載翻譯小說，有的還以刊載翻譯小說為主。這些雜誌中，較為著名的有《小說世界》(1905)、《新世界小說社報》(1906)、《月月小說》(1906)、《小說林》(1907)、《競立社小說月報》(1907)、《中外小說林》(1907)、《小說七日報》(1908)、《新小說叢》(1908)、《揚子江小說報》(1909)、《小說時報》(1909)、《小說月報》(1910)、《自由雜誌》(1913)、《遊戲雜誌》(1913)、《民權素》(1914)、《中華小說界》(1914)、《小說叢報》(1914)、《禮拜六》(1914)、《繁華雜誌》(1914)、《小說海》(1915)、《小說新報》(1915)、《小說大觀》(1915)、《青年雜誌》(1915，第二年改名為《新青年》)、《小說畫報》(1917)等等。其他有些綜合性雜誌及社會科學雜誌，也有刊載翻譯小說的。這許多陣地，為發表翻譯小說創造了條件。(四)留學生增多，使得翻譯工作者隊伍擴大。1905年以後，出國留學的人數日漸增多，尤其是赴日留學的人數增加得更多，如1905至1906年之間，留日學生竟創下八千人以上的紀錄。留日學生之所以這樣多，一方面是由於當政者認為日本是君主立憲體制，和他們的要求相符合。另一方面，客觀上日本離中國近，費用省，如去日本的旅費，每人僅需六、七十日元，¹而去美國則需三、四百兩；在日本的起居飲食，每年只需250—300日元，而在西洋，則歲需1500兩左右。這些留學生中的許多人，如蘇曼殊、魯迅、周作人、伍光建、戡翼翬等等，後來都成了翻譯家，積極翻譯小說。(五)廣大讀者羣的形成，是翻譯小說繁榮的又一重要條件。與過去不同，這時翻譯小說的讀者羣大為擴大，包括舊知識分子、新知識分子和市民。舊知識分子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除了舊學以外，也開始接觸新學，閱讀翻譯小說。學堂的設立造就了一大批新知識分子(包括在校學生)，他們是翻譯小說的忠實讀者。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大中城市的繁榮，形

1 當時每一兩銀約合1.4日元。

成和擴大了市民階層。市民中稍有文化者，也閱讀書報雜誌，閱讀翻譯小說。在商品經濟的社會裏，書籍雜誌也是一種商品。既然有這樣廣闊的市場，那末，它的繁榮是必然的。所以，廣大讀者羣的形成、讀者的需求，促成了翻譯小說的進一步繁榮。

近代翻譯小說，為「五四」以後翻譯小說的新發展作了準備，是中國翻譯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

二

近代翻譯小說在發展過程中，具有下列特點：

一、由意譯(介紹故事梗概，有所刪節，甚至有所增添)逐漸向直譯(忠實於原著)發展。

最初翻譯外國小說，只介紹故事梗概，如《一睡七十年》，只有一千多字的梗概。許多人翻譯長篇小說，主要是譯介作品的主要情節，介紹作品完整的故事，把主要情節之外的副線或一些插入段落刪去。這裏明顯可以看出是受了傳統小說的影響，讓讀者聽(看)一個有頭有尾的完整故事，凡與這一故事無關的細節，盡行刪除。至於刪去景物描寫和人物的心理描寫，那更是普遍現象。所謂「譯意不譯詞」，頗為大家所信奉。又由於許多翻譯家本身就是作家，在翻譯作品時，不免有所「創造」，常常添枝加葉，增加一些內容，如包天笑譯《馨兒求學記》時，插進數節家事；蘇曼殊譯《慘世界》時，增添許多內容。吳趸人把原譯文僅六回的《電術奇談》敷衍成二十四回，「改用俗語，冀免翻譯痕迹」，原有人名地名「經譯者一律改過，凡人名皆改為中國習見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國地名」，更「間有議論諧謔等，均為衍義者插入，為原譯所無」，實際上是半譯半作。所謂「譯述」，是又譯又述，成為一時的風氣。隨著小說地位的提高和譯作的風行，翻譯家對翻譯工作也認真嚴肅起來，忠實於原著或基本上忠實於原著才成為風氣。許多作品都能不失原著的內容、風格，翻譯的質量也明顯提高。

二、由文言逐漸向白話發展。

當時翻譯小說，大都用文言，不但林譯小說是用古文翻譯，其他許多作家也用文言翻譯。這在當時有其歷史原因，是不足為奇的。那時社會上通行的是文言(特別是在知識界)，而小說的讀者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只有用文言翻譯小說，才會被他們接受。但是，用文言翻譯小說，在傳播上必然受到很多限制，因為艱深的文字，很難在初通文字的讀者中流傳。為了在更大範圍內傳播，於是翻譯家就用一些淺近的文體進行翻譯。這種淺近的文體，介於文言和白話之間。後來一些有識之士更大力提倡白話文。早在 1887 年黃遵憲就指出：「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

多。」²梁啟超也注意文體的改革，他曾對人說：「俗語文體流行，實文學進步之最大關鍵也，各國皆爾，吾中國亦應有然。」³1898年，裘廷梁發表著名論文《論白話為維新之本》，⁴明確提出「崇白話廢文言」的口號，系統地論述了推行白話的必要性，認為「有文字為智國，無文字為愚國；識字為智民，不識字為愚民；地球萬國所同也。獨吾國有文字而不得為智國，民識字而不得為智民」，其原因乃是「文言之為害」。他還詳細論證了白話有「八益」。另一白話文運動的先驅者陳子褒也著文提倡白話文。在大家的倡導下，白話文運動迅速開展起來，白話報紙紛紛創刊，⁵白話教科書、白話通俗讀物大量印行。翻譯界也用白話翻譯小說，有的翻譯家如周桂笙、周瘦鵑，既用文言，也用白話翻譯小說。有的翻譯家如吳禱、伍光建，基本上用白話翻譯小說。後來，用白話翻譯的人越來越多，白話譯文的水平也日漸提高。到了「五四」前夕，有的翻譯家的白話譯文已相當流暢了，這為「五四」以後全面使用純正的白話打下了基礎。

三、名著逐漸增多。

早期的翻譯，名家名作較少，二三流的作家作品較多。這是因為翻譯家只注重作品的情節，為了向讀者講述故事，或者只著眼於改良羣治，為了向讀者進行宣傳；也是因為翻譯家對外國文學瞭解不多及受自身對作品的鑒賞能力的限制。所以，在選擇翻譯的底本時，標準不高，要求不嚴，著名作家的作品就很少翻譯。隨著譯者對外國文學了解的增多、藝術鑒賞能力的提高，許多名家名作才陸續介紹進來。陳平原曾作過一個統計，從1899年至1916年翻譯出版的二十部長篇小說中，1904年以前出版的只有三部，1905年至1916年的有十七部，作者有司各特、笛福、期威特夫、萊蒙托夫、大仲馬、狄更斯、歐文、雨果、契訶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品如《魯濱遜飄流記》、《格列佛遊記》、《一千零一夜》、《當代英雄》、《三個火槍手》、《老古玩店》、《見聞雜記》、《大衛·科波菲爾》、《第六病室》、《海上勞工》、《九三年》、《復活》、《春潮》等。以上說的是完整的長篇小說，還不包括節譯本，也不包括短篇小說。如果連同節譯本和短篇小說一併計算，那末，名家名作數字是很可觀的。名家名作的增多，標識著翻譯水平的提高，而且對讀者了解世界文學、提高文學素養，都大有好處。

四、短篇小說翻譯的增多。

2 黃遵憲：《日本國誌》，卷三十三，《學術誌二》。

3 楚卿：《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新小說》第7號。

4 見《無錫白話報》。

5 如長江下游各省出版的白話報紙就有：《無錫白話報》（1898年出版，第五期起改為《中國官音白話報》）、《杭州白話報》（1901）、《蘇州白話報》（1901）、《揚子江白話報》（1901）、《中國俗話報》（1903）、《初學白話報》、《上海新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國民白話報》、《江西新白話報》等等。其他各地也有許多白話報。

1905年以前，翻譯小說以中長篇為主，短篇的很少，只有陳匪石譯的《最後一課》(1903)、魯迅譯的《哀塵》(1903)、陳景韓譯的《義勇軍》(1904)等少數幾種。1905年以後，短篇小說逐漸增多，不但翻譯介紹了美國的馬克·吐溫、波蘭的顯克微支、英國的司各特的短篇小說，而且在翻譯單篇短篇小說的基礎上，還出版了短篇小說的作家專集和選集。專集如林紓和陳家麟的托爾斯泰的兩個短篇小說集：《羅刹因果錄》(1915)和《社會聲影錄》(1917)，陳家麟和陳大鏡譯的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風俗閑評》上下冊(1916)，其中共收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二十三篇，可說是第一次較全面地介紹了契訶夫的作品。選集如周氏兄弟譯的《域外小說集》一、二集，1909年出版，除收契訶夫、安特萊夫、王爾德、莫泊桑的作品外，特別注重收錄東北歐的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如波蘭、芬蘭、波希米亞作家的作品)，有其特殊意義。魯迅在序中說：「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自此始入華土。」在選擇的慎重、對原著的忠實上，這種嚴肅的態度確是獨樹一幟。此書雖只賣出二十一部，影響不大，但意義卻極為深遠。另一種是周瘦鵑翻譯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1-3集，1917年出版，收十四國四十七家的作品。其中有一冊專收英、美、法以外的，像荷蘭、西班牙、瑞士、芬蘭等國的作品。這一譯本，曾得到教育部嘉獎，也頗受魯迅稱讚，譽之為「昏夜之微光，雞羣之鳴鶴」。

五、專業翻譯家的出現。

近代翻譯小說的譯者，一般都有各自的職業，如作家、編輯、留學生等等，很少有專門以翻譯為職業的。後來才出現以翻譯為職業，或以翻譯為主要職業的專業翻譯家，如吳禱、伍光建等等。專業翻譯家的出現，說明大家對翻譯的作用認識有了提高，翻譯家受到大家尊重。專業翻譯家的出現，使譯作的水平有所提高。他們專心致志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作品時，反覆推敲，精益求精，為近代翻譯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

中國近代小說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受傳統小說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受外來小說的影響。而後一種影響，是過去所沒有的。下面簡略地敘述一下在域外小說影響下，近代小說發生的變化。

一、在域外小說影響下，文學觀念起了變化。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小說被視為小道，處於文學的邊緣地位，甚至被排斥在文學之外，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到了近代，由於康有為、嚴復、夏曾佑，特別是梁啟超的提倡和鼓吹，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重新估價小說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

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喻，當以小說喻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康有爲)。「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爲說部之所持」(嚴復、夏曾佑)。「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梁啟超)。把小說提高到極重要的地位。更加上域外小說的大量輸入，使大家的文學觀念起了變化，不再把小說視爲低下的文學樣式，而和詩文同等看待，甚至看得比詩文還高。不但一般知識分子積極從事小說的翻譯和創作，連那些飽學之士也著手小說的翻譯和創作。文學觀念的轉變大大促進了小說創作的發展，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小說高潮。

二、在域外小說的影響下，小說的題材有了擴展。

中國傳統小說多的是人情小說、神魔小說、俠義公案小說、歷史小說、狹邪小說。隨著域外小說的傳入，政治小說、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相繼介紹進來，即使是外國的言情小說，也比中國的人情小說更豐富多彩。這給中國作家帶來很大的影響，使他們大開眼界。在外國小說的影響下，小說創作的題材有所擴展，作家們不僅學寫政治小說、科幻小說和偵探小說，更重要的是，學習外國作家把視線轉向下層社會，去描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使小說的題材更加多樣化，由此而出現了五彩繽紛的局面，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三、在域外小說的影響下，小說的表現手法、表現技巧有所創新。

由說書演變而來的中國長篇小說，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程式化了，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如章回體、回目詩、「話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描寫人物，形容美醜，也是千篇一律的詞句，也很少景物描寫，敘事方式則是全知敘事。因此最初在翻譯外國小說時，也還是套用中國舊小說的模式，如分章分回、代擬回目、刪去景物描寫和心理描寫、講些套語套話；創作小說時，更是沿用中國舊小說的模式。到後來，翻譯小說逐漸忠實於原著，不輕易刪改，盡量體現原作的風格。而在創作上，則努力向外國小說學習，吸取外國小說的種種表現手法、表現技巧，出現了不分章分回、沒有回目詩的中、長篇小說(如蘇曼殊的小說)，出現了倒敘的表現手法(如吳趸人的《九命奇冤》)，也出現優美的景物描寫(如劉鶚的《老殘遊記》)，使中國的小說形式和世界的小說形式相接近。

四、在域外小說影響下，典型人物的塑造、人物心理描寫等方面，也都起了變化。

由於中國古典小說表現手法程式化，小說在塑造典型人物時，也不夠多樣化，更缺少人物的心理描寫。域外小說藝術上的多樣化，給中國作家以很大啟示。在外國小說潛移默化的影響下，中國作家也學習外國小說塑造典型人物的方法(如曾樸的《孽海花》)，學習外國小說心理描寫的方法(如吳趸人的《恨海》)，使中國的小說更豐富多彩。

五、在域外小說的影響下，小說語言有了變化。

小說語言，是小說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的變革，是小說變革的重要方面。中國近代小說在外國小說的影響下，語言起了極大變化。一是由文言逐漸變為白話。起初是文言為主，白話較少，逐漸發展成為文白並存。後來白話逐漸增多，文言相對減少，為「五四」後全面提倡白話文作了準備。一是新名詞的輸入，這首先得益於翻譯小說。先是在翻譯小說中出現許多新名詞，然後在創作小說中也有了新名詞。一是句式的變化，如歐化語法(包括日本式的語法)、倒裝句等等。一是標點符號的使用。中國原來只有句讀，沒有標點。標點符號剛輸入時，還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和譏笑(如吳趸人)。但隨著翻譯小說的大量流行，標點符號也為大家所接受，從而廣泛地使用起來。

總之，外國小說給近代小說創作以多方面的影響，使近代小說引起變革。當然，中國小說徹底的變革，至「五四」以後才完成；但在從傳統小說至現代小說的變化過程中，近代小說的變革則起着過渡的作用、橋樑的作用，是整個變革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